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AMI 入库集刊

藏学学刊

བོད་ཐི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33 辑

2025(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བྱས་དེབ།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学术顾问

(以姓氏拼音为序)

阿旺嘉措 巴桑旺堆 才让 黄维忠 李志农
刘志扬 罗布 沈卫荣 苏发祥 索端智 仝涛
谢继胜 夏格旺堆 叶拉太 意西微萨·阿错 张云

编辑委员会

主编 霍巍 石硕

执行主编 张长虹

副主编 玉珠措姆 陈波

编辑委员会委员 黄博 李锦 李帅 励轩

(以姓氏拼音为序) 吕红亮 南英 熊文彬

徐君 杨锋 邹立波

本期编辑 张延清 嘎尔让 许渊钦

杨清凡 李志英 卢素文

英文摘要 麦伟哲 (William A. McGrath)

编辑部主任 孙昭亮

目 录

唐李知古经略姚州相关史实考察——兼论睿宗朝对吐蕃政策的两次转向	严寅春 薛婧 / 1
元明时期西藏回遮蒙古人之咒术仪轨实践探析	多杰仁青 / 12
宗喀巴与帕竹地方政权交往关系新探	拉毛加 / 32
1708 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驻留西安广仁寺考——以一道《康熙满文朱批奏折》为证	胡晓兵 次仁德吉 / 49
七世达赖喇嘛移驻康区与雍正八年的瞻对之役	刘锡钺 / 70
康雍乾嘉朝时期多伦诺尔寺历任札萨克达赖喇嘛考述	苏都必力格 呼和 / 87
八世哲布尊丹巴在藏转世史实考	孙琦 / 103
藏文梵语拼读法类文献研究(一): 从 10 世纪末的梵文转写到西藏第一部梵语拼读法文献	扎西本 / 116
托忒文文献《札哈沁寺庙志》考述	M. 乌兰 阿音娜 特尔巴图 / 154
中国西藏东南地区“颇萨”税考析	马睿 / 168

梅·戈尔斯坦及其美国与中国西藏地方事务关系研究	柳欢 徐海霞 / 187
近五十年来《川番译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振 / 201
陈庆英先生藏学年谱初编	许文静 / 216
互动与交融：第二届“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评述	
.....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 245	
摘要	/ 278

Table of Contents

A Study of Li Zhigu's Governing of Yaozhou —— Two Shifts in Emperor Ruizong's Policy Toward Tubo <i>Yan Yinchun Xue Jing</i>	1
An Analysis of the Mongol-repelling Ritual Practices in Xizang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i>Dorje Rinchen</i>	12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songkhapa and the Pakmodrupa Regime <i>La maojia</i>	32
A Study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Tsangyang Gyatso's Travels to the Guangren Temple in Xi'an in 1708 <i>Hu Xiaobing and Ciren Deji</i>	49
The Relocation of the Seventh Dalai Lama to Kham Region and the Battle of Nyarong in 1730 <i>Liu Xiyue</i>	70
A Study on the Successive Incarnations of the Zasak Da Lama of the Dolonnor Monasteries during the Kangxi, Yongzheng,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s <i>Sodbilig Huhe-Borjigid</i>	87

A Study of the Reincarnation of the Eighth Jebtsundamba in Xizang <i>Sun Qi</i>	103
Reading Sanskrit in the Tibetan Literature (1): From Tenth-century Transliterations to the First Tibetan Guide to Sanskrit Pronunciation Methods <i>Tashibum</i>	116
An Examination of the Todo Script Document: <i>The Chronicle of Jakhachin</i> <i>Monastery</i> <i>M. Ulaan, Ayanna and Töröbatu</i>	154
An Analysis of the <i>Posa</i> Tax in Southeast Xizang, China <i>Ma Rui</i>	168
Melvyn Goldstein and His Stud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cal Affairs of Xizang in China <i>Liu Huan and Xu Haixia</i>	187
A Review and Outlook of Research on the <i>Chuanfan yiyu</i>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i>Wang Zhen</i>	201
A Preliminary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Prof. Chen Qingying in Tibetology <i>Xu Wenjing</i>	216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A Review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Along the Plateau Silk Road <i>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i> <i>Xiza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i>	245
ABSTRACTS	278

七世达赖喇嘛移驻康区与雍正八年的瞻对之役^{*}

刘锡钺

内容摘要：扼川藏道咽喉的瞻对是川藏地区的一个独特区域，清朝曾多次对该地用兵，当地的每次事件都牵涉着川藏全局，故“瞻对问题”历来为研究者重视。然而，该问题初起的雍正时期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雍正八年（1730年）的瞻对之役是在七世达赖喇嘛移驻康区，以及川藏道在清朝治藏战略中地位提升的背景下发生的。雍正七年（1729年）下半年至八年初川藏道沿线一系列抢劫事件的发生，既威胁到七世达赖喇嘛的安全，也妨碍了清朝通过川藏道对西藏进行有效施政，促使清朝发兵万余人强硬“清剿”。此次用兵是清朝发动的第二次瞻对之役，不可与雍正六年（1728年）至七年的第一次瞻对之役混为一谈。清军将领马光在并未捕获全部首犯的情况下即仓促撤兵，非但没有震慑住劫匪，反而成为此后“瞻对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性解决的重要根源。

瞻对（ཕྱགས་མཐུད་，今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是清代川藏地区一个独特的区域，扼南、北两条入藏通道，居众土司之中，形势险要。清廷曾先后数次对其用兵，该地的每次事件都牵涉着川藏全局。同治四年（1865年）清朝将该地划归西藏地方政府

^{*} 本文为四川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2025年“揭榜挂帅”项目“四川藏彝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与探索实践”（CSDZL25-27）的阶段性成果。

管辖，却因帝国主义的入侵及西藏地方派驻瞻对之藏官的苛虐，引发了更为严重的边疆危机，故“瞻对问题”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¹。瞻对地区民风剽悍，盛行“夹坝”（ཇལ་པ་）活动。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军首次通过川藏道入藏及该道成为清朝治藏关键依托的大背景下³，“夹坝”活动显然妨碍了清朝对西藏的有效治理，故其逐渐进入了清廷的视野。雍正五年（1727年）西藏发生噶伦内乱事件后，次年，一路清军再次由川藏道进藏，但瞻对“夹坝”抢劫了沿途塘站的马匹、行李等物，引发了雍正六年至七年（1728—1729年）清朝第一次对瞻对用兵。草率结束后，“夹坝”依然猖獗，并威胁到了时在康区的七世达赖喇嘛（སྐལ་བཟང་རྒྱ་མཚོ། 1708—1757年）的安全，促使雍正八年（1730年）清朝第二次发兵。这两次用兵不仅体现了川藏道及其所在的康区在清朝治藏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也是“瞻对问题”的初起阶段，有助于理解该问题的根源与机制。

然而，前辈学者对雍正朝用兵瞻对的研究成果较少，仅有张秋雯对雍正六年至七年的第一次瞻对之役进行的专门研究⁴。对雍正八年的第二次瞻对之役，基本的背景与史实仍不甚清晰，甚至有学者将两次战役混为一谈⁵。基于此，本文主要利用北京与台北两地馆藏满、汉文档案，尝试还原第二次瞻对之役的前因后果，挖掘清代“瞻对问题”的根源，管窥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 1 相关研究主要有陈一石：《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一）（二）（三）》，《西藏研究》1986（1-3）：37-42、47-54、40-50。任新建：《论清代的瞻对问题》，贾大泉主编：《四川历史研究文集》，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158-178。张秋雯：《清代嘉道咸同四朝的瞻对之乱——瞻对赏藏的由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22）：397-420。孙子和：《清末川边工布朗结之乱》，《西藏史事与人物》，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31-57。张秋雯：《清季鹿传霖力主收回瞻对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8（29）：1-45。徐君：《清季对川边的认识与决策（上）——兼论瞻对问题的由来》，《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16-27。张秋雯：《赵尔丰与瞻对改流》，台北：“蒙藏委员会”，2001：1-74。刘源：《乾隆时期的瞻对事件》，《中国藏学》2007（3）：40-44。玉珠措姆：《史学家对工布郎吉土司形象的构建》，《民族学刊》2012（5）：18-29。玉珠措姆：《瞻对工布朗结在康区的兴起探析》，《中国藏学》2014（2）：31-42。玉珠措姆：《瞻对工布朗结事件对清末汉藏关系的影响》，《中国藏学》2015（2）：121-126。Yudru Tsomu, *The Rise of Gönpo Namgyel in Kham: 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5。潘崇：《承前启后：锡良督川时期筹瞻川属考》，《史林》2015（3）：77-85。石硕：《瞻对：小地方、大历史——清代川藏大道上的节点与风云之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1）：46-50。冯翔、喜饶尼玛：《从瞻对总管看现代中国的初步构建》，《民族史研究》第14辑，2018：56-74。
- 2 即抢劫、强盗之意。
- 3 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中山大学学报》2018（3）：136-146。
- 4 张秋雯：《清代雍乾两朝之用兵川边瞻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2（27）：261-286。
- 5 陈一石：《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一）》，《西藏研究》1986（1）：38。

一、七世达赖喇嘛移驻康区及清廷对其安全的重视

雍正五年六月西藏噶伦内乱即阿尔布巴（བཀ་ཕོད་པ་རྩེ་བླ་པོ།？—1728年）一党杀康济鼐（ཁང་ཆེན་ནས་བསོད་ནམས་བླ་པོ།？—1727年）之事发生后，清军不仅通过川藏道往返西藏，于沿途安设塘站，撤回时还将七世达赖喇嘛沿此路转移至理塘及噶达（མཁར་ཐར་，今属四川道孚县）。从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728年12月24日）七世达赖喇嘛离藏前往理塘，至雍正十三年七月十二日（1735年8月29日）返回布达拉宫，他在川藏道沿线地区生活了近7年之久。在这期间，川藏道及其所在的康区在清朝治藏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⁶。在此背景下，扼川藏道咽喉的瞻对“夹坝”的劫掠活动，不仅威胁到由内地往返西藏的大路，也是七世达赖喇嘛安全的重大隐患，这是雍正八年清朝用兵瞻对的关键背景。

康济鼐被杀后，由于七世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བསོད་ནམས་དར་བླ་པོ།？—1744年）实预其谋，且其与阿尔布巴等人、准噶尔蒙古等都有复杂的姻亲关系，这实际上代表了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西藏宗教势力对政治事务的干预，这在自顺治帝以来就一直努力将达赖喇嘛权力限制于宗教事务方面的清朝看来无疑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⁷。所以，清军进藏后将七世达赖喇嘛移出西藏便成为迫在眉睫之事⁸。

雍正六年九月初九日（1728年10月11日），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1686—1754年）上奏称：以瞻对为首的诸多部落在川藏道沿线抢劫，对往来士兵及粮饷造成了较大危害，建议调兵“进剿”。雍正帝批准，发动了第一次瞻对之役。另外，雍正帝在此折后批道：

好，应惩治者。况将来又移驻喇嘛，当预令知法。喇嘛住居之庙地方，卿亦当筹画奏闻矣，庙之形势，朕大紧要（按，原文如此）在十万两之上，二十万两之内，欲成一大局面方能久长，卿可斟酌料理奏闻。⁹

6 王丽娜、朱金春：《七世达赖喇嘛移驻惠远寺与清朝对康区控制的强化》，《西北民族论丛》第20辑，2019（2）：167-181。

7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304。

8 《岳钟琪等奏陈办理西藏事宜十项折》，雍正六年三月初四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427。

9 《岳钟琪奏报剿除翁布等处贼蛮折》，雍正六年九月初九日，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312。

此折本身的主题是调兵清理瞻对等部落，雍正帝表示认可后，却笔锋一转，将用兵瞻对一事与移驻七世达赖喇嘛共同考虑，要求岳钟琪筹划移驻庙宇的位置、需要花费的银两。其中，“况将来又移驻喇嘛，当预令知法”一语最为关键，雍正帝认为，要将七世达赖喇嘛顺利移驻康区的话，必须先清除瞻对等部落对川藏道沿线的威胁。

九月十六日（10月18日），岳钟琪上奏请示达赖喇嘛及颇罗鼐使者可否赴京一事，雍正帝在折后再次提醒岳钟琪与即将从藏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前来的吏部尚书查郎阿（1684—1747年），要密切注意七世达赖喇嘛在川藏道上的安全：

……再者，着喇嘛来，恐索纳[诺]木达尔扎疑畏。或有里塘、巴塘一带无知番众阴留之举，亦不可不预防。恐查郎阿等视为轻易，带护送兵太少，临期恐烦措置，卿可留心，知会查郎阿。再，一路如何防备处，加意料理可也。料亦无此事，但亦不可不防范者。¹⁰

雍正帝强调，就算无事也不可不严加防范川藏道沿途“无知番众阴留之举”，令岳钟琪通知时在拉萨带兵的查郎阿，护送之兵不可太少，一路必须加意料理防备。

岳钟琪回复道，理塘、巴塘一带番民“其心实皆恭顺，今闻达赖喇嘛与大兵同来，自必共相欢悦。况伊等身依圣化，已非一日，必不致有梗顽之事”¹¹。就此语来看，岳钟琪认为雍正帝可能多虑了。而且沿途虽然有抢劫之事，但自九月以来便已奏请调兵清理，并于次年初正式用兵，岳钟琪颇为自信，“查此等贼番不过以抢夺为事，自可易于料理”¹²。从随后的用兵过程来看，显然他对清理“夹坝”的难度过于轻视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4日），查郎阿携带七世达赖喇嘛，在前后数批清军的护卫下自布达拉宫起程，沿着川藏道向东前行。沿途台站官兵以及昌都之清军暂时未撤，以期声息相通，并保护达赖喇嘛，俟达赖喇嘛抵达理塘后再视具体情形而定¹³。

雍正七年二月初九日（1729年3月8日），查郎阿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到达理塘，住进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བསའ་ར་ནམས་བླ་མོ། 1543—1588年）所建的长青春科尔寺，在噶

10 《岳钟琪奏为达赖喇嘛及颇罗鼐使者可否赴京请旨折》，雍正六年九月十六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1994：430-431。

11 《岳钟琪奏报撤退部分驻藏官兵折》，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1977：549。

12 《岳钟琪奏报撤退部分驻藏官兵折》，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1977：549。

13 《周瑛奏报查郎阿等护送达赖喇嘛自藏起程日期折》，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1994：433-434。

达新庙建成前先在此地居住。清廷令跟随大军返回的驻藏大臣马腊留在理塘照看达赖喇嘛¹⁴，又派副都统肅格前往理塘照看，并派重庆镇总兵官任国荣，统领由藏撤回的四川精兵 2000 名驻扎保护¹⁵，两人分别于二月二十六日（3 月 25 日）与三月初三日（3 月 31 日）抵达¹⁶。

此时，第一次瞻对之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清军统帅黎雅营游击高奋志擅自杀死了遵命投见的瞻对土司测冷滚布（ཆོ་རིང་མགོན་པོ་），引起瞻民的惊惧。后者依托当地山高雪深的自然条件，与清军展开了殊死对抗，导致清军深陷泥沼，无法脱身。为了节制高奋志等人，岳钟琪令在理塘的任国荣就近指挥针对瞻对的用兵，但强调其“有防护达赖喇嘛之责，不得擅离汛守”¹⁷，可见达赖喇嘛的安全仍是重中之重。

四月，噶达新庙正式开工建设，预备建成后将七世达赖喇嘛移驻于此，为此，清廷开始讨论增强该地及周边地区的防守事宜。岳钟琪上奏指出：近年来，打箭炉（དར་ཅེ་མའོ་，今四川康定）以外理塘、巴塘各处地方均已纳入清朝治理之下，番民纳赋当差如同内地，且天全也已改土归流，故可酌减已成腹里的化林坪一地的驻兵。具体来说，化林坪原设额兵 1000 名内，留兵 300 名即可，另拨 200 名驻扎打箭炉，拨 500 名驻扎噶达。另外，于雅砻江渡口中渡（ཉལ་རྩུཁ་，今四川雅江县）设守备一员，兵 200 名；上渡、下渡各设千总一员，兵各 100 名。而且，为防备瞻对滋事，于通瞻对之渡口吹音堡亦应设兵防守：

再，于噶达之西二百五十里为吹音堡，亦系雅笼〔砦〕江渡口，过江为瞻对土司地界。而瞻对、霍尔一带番蛮渡江皆由于此，防范最宜紧严。更请于吹音堡添设千总一员，马二步八，兵一百名，以防瞻对往来之境。¹⁸

这样一番在噶达周围的周密安排，不仅可以保护七世达赖喇嘛的安全，还可以钳制

14 查郎阿则前往西安署理川陕总督印务。

15 《清实录》第 7 册，《清世宗实录》卷 76，雍正六年十二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1985：1129。

16 《肅格等奏行抵里塘会见达赖喇嘛情形折》，雍正七年三月初六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 2 册，1994：435。《任国荣奏报达赖喇嘛住里塘情形折》，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13 辑，1977：479。

17 《黄廷桂奏报臣咨商督臣岳钟琪就近调重庆镇任国荣进剿瞻对贼蛮折》，雍正七年四月十一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12 辑，1977：837。

18 《岳钟琪奏报噶达添拨官兵分设汛防折》，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5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373。

理塘、巴塘等川藏道沿线地区。随后清廷内部讨论通过¹⁹。

清廷上下正在讨论噶达新庙附近防务之时，第一次瞻对之役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测冷滚布之母无意与清廷长期对抗，遂选择主动投降，并派人至任国荣处“哀鸣”，揭发了测冷滚布被高奋志冤杀的实情。实际上，测冷滚布在会见高奋志之前，并没有明显抗拒清廷的行为。由于高奋志擅自将测冷滚布及其跟随之人打死，导致“众番”畏惧逃回，抵抗清朝。抵抗之事都发生在测冷滚布被杀以后。岳钟琪认为，此事责任全在高奋志：“是测冷滚布已经赴营投顺，而高奋志妄行杀害，复捏称拒敌被伤，是以梟斩，希图掩饰其擅杀降人之罪。既肆其狂妄于前，复任意欺诈于后，狡妄不法，莫此为甚。”²⁰雍正帝更是吃惊，在岳钟琪奏后批云：“岂有此理，此可谓小人误事也。”²¹清廷失去了继续用兵的理由，令时年十九岁的测冷滚布长子班滚扎纳登承袭瞻对安抚司之职，于六月草草收兵了事。

第一次瞻对之役结束后，任国荣奏称：七世达赖喇嘛在理塘安静居住，对皇帝极为感激。凡派人回藏搬运物件，或去打箭炉采购物资，俱来向任国荣报告，总之，“现今仰赖洪庥，僧俗相安，兵民共辑，俨然极乐之区”²²。雍正帝强调，必须有备无患，做好防备，不可疏忽大意：

极乐固好，但不可疏忽。若不防，乐极生悲，迨非苦乐之道也。一切事宁有备方无患，机在事先，方不忙误。敬慎为之。²³

任国荣头脑尚算冷静，称自己时常担心防护有所不周：“兢兢业业，常惧有不周之处，夙夜靡宁。”雍正帝专门用朱笔圈出此句，并批道：“如此方是，万不可大意。”²⁴由以上君臣之间的互动亦可见清廷上下时刻留心七世达赖喇嘛的安全。

¹⁹ 《清实录》第8册，《清世宗实录》卷82，雍正七年六月辛丑，1985：95。

²⁰ 《岳钟琪奏报擒杀瞻对逆司测冷滚布折》，雍正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辑，1977：488。

²¹ 《岳钟琪奏报擒杀瞻对逆司测冷滚布折》，雍正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辑，1977：488。

²² 《任国荣奏报达赖喇嘛住里塘情形折》，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辑，1977：479。

²³ 《任国荣奏报达赖喇嘛住里塘情形折》，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辑，1977：479。

²⁴ 《任国荣奏报达赖喇嘛住里塘情形折》，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3辑，1977：479。

雍正八年藏历正月二十一日（1730年3月10日），七世达赖喇嘛自理塘出发，藏历二月初三日（3月21日）抵达噶达新庙²⁵。此庙是清朝专门仿照哲蚌寺的形制，为七世达赖喇嘛驻锡耗时近一年而建造，规模宏大，有殿堂楼阁1000余间，平房400余间，并融合了藏、汉多民族的建筑风格²⁶。雍正帝赐汉名“惠远”（མགར་ཐར་བྱམས་པ་ལྗིང། 意为“弥勒之洲”），并撰写了御制碑文。

同年四月，清廷又在噶达、上中下三渡及吹音堡之间新设了55个塘铺，新修塘房、烟墩、哨楼，以盘查往来人员并递送公文²⁷。另外，重新调整了噶达周围的军事建制，将化林协移驻噶达，改名泰宁协，驻兵500余名。整合周边地区的驻兵，于中渡设德靖营，打箭炉设阜和营，灵雀寺（今四川道孚县）设宁安营，统归泰宁协节制²⁸。

总之，七世达赖喇嘛移驻理塘与噶达，体现了川藏道及其所在的康区在清朝治藏战略中地位的提升，在此过程中，七世达赖喇嘛本人的安全更是重中之重，为此清廷加强了川藏道沿线地区的防守事务，康区的军事重心从化林坪向西推进至噶达²⁹。不过，出人意料的是，第一次瞻对之役结束后不久，雍正七年下半年至八年初，又发生了数起“夹坝”事件，甚至七世达赖喇嘛所属的物资也被抢夺。按照雍正帝对抢劫事件一贯的强硬态度，这是其无法容忍的，为此，掀起了雍正朝第二次对瞻对的用兵。

二、川藏道沿线“夹坝”猖獗与清廷的强硬政策

雍正七年六月清朝第一次用兵瞻对草草收场后，“夹坝”活动几乎没有得到什么“震慑”，雍正七年下半年至八年初，几乎每个月都有抢劫案发生，“夹坝”极为猖獗。兹将档案中记载的抢劫事件列表汇总如下：

25 章嘉·若贝多杰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102。

26 玉珠措姆：《七世达赖喇嘛驻锡地惠远寺与康区地方土司及清廷的互动》，《中山大学学报》2018（3）：147-161。

27 《清实录》第8册，《清世宗实录》卷93，雍正八年四月戊申，1985：246。

28 乾隆《雅州府志》卷10《兵制》，《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2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232-233。

29 石硕主编：《康藏史》（古代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434。

表一 雍正七年下半年至八年初的“夹坝”案件

时间	地点	抢劫事件
雍正七年八月十八日 (1729年10月10日)	巴塘附近察树汀	武举人宋邦杰至江卡尔地方采买粮食,被桑昂邦人掠去塘马一匹,乌拉马一匹,官银二十四两。
雍正七年九月十五日 (1729年11月5日)	理塘以南鄂里丫地方	劫匪抢去七里戎家马九十二匹,七里戎之右腿中一箭,其妻阿苏木之左膝中一箭。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1729年11月19日)	理塘附近之喇嘛庙	瞻对之民察德胜邦带十余人抢去牛羊、骡马及达赖喇嘛所属驮水骡八头,家人骡马七头亦被抢去。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1730年1月20日)	理塘附近黄土岗	巴塘喇嘛家人额龙堪雀来理塘买茶,遇“夹坝”百十余人打抢带有驮鞍骡子、马、银子、大铁锅、衣服、帽子等物。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1730年1月20日)	理塘附近黄土岗	普纳太吉差人五名到理塘与达赖喇嘛进贡,被瞻对“夹坝”抢去稟贴、毡毯、银子、珊瑚、珍珠、骡马、衣服等物。
雍正七年底	理塘附近嘎拉喇山	格瓦奔松塘土兵扎西、齐林岱二人,前往海宁地方买奶油,行至嘎拉喇山下,突遇贼伙,扎西之鼻梁受一刀伤,齐林岱之头部受一刀伤。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730年2月16日)	理塘以西喇儿塘	塘兵张万班赶六匹塘马至溪饮水,突有三人前来,抢走一匹菊花青驷马,张万班等即追至山沟,见有六、七十人,未敢再追。
雍正八年正月初一日 (1730年2月17日)	理塘以东	八十余名劫匪抢去四十六匹马。
雍正八年正月十五日 (1730年3月3日)	理塘东南郎谷地方	七十余名“夹坝”劫走三十二匹马与六十头牛。

资料来源:《宪德黄廷桂奏报两河口地方设兵巡哨折》,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5辑,1977:397。《藉格奏报里塘巴塘一带盗贼猖獗折》,雍正八年二月十七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998:1936-1939。

根据上表,此期至少发生了九起“夹坝”事件。乾隆《雅州府志》亦记载,理塘附近“惟接壤之瞻对擦马所、热色、热泥等地,贼番倚恃山路崎岖,出没不时,于里塘之黄土岗、海子卡、虎皮沟、喇六丫等处劫抢商旅,偷盗牛马,多受其害”³⁰。鉴于七世达赖喇嘛在理塘驻锡,且于雍正八年二月转往噶达,“夹坝”活动显然威胁到了七世达赖喇嘛的安全。

实际上,在此数起“夹坝”事件尚未发生,即第一次用兵瞻对刚刚完结之后,任国荣便曾提出对抢劫事件的应对方案。他根据在理塘居住半年有余所了解到的当地情形,

30 乾隆《雅州府志》卷11《土司》,《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廿八号,1969:286。

提出川藏道各塘站应用土兵坐塘。雍正六年清军进藏时，在沿途设置台站，每站的驻兵为汉藏混合模式，但事后驻藏汉兵及沿途汉兵势必撤回，如果数千里之长途不设一塘，不置一卒，则将来公私往返之人颇多，难保不发生事故。他提出，乘目前有汉兵坐台，令理塘等处土司每台派 15 名土兵及 5 匹马，一年一换，向汉兵学习台务。汉兵撤后，则“改台作塘”³¹，由土兵坐塘，互相联络，缉拿“骑马带械无籍番蛮”。如果发生盗窃抢劫之事，则协力穷追；如果土兵坐视不理，防查不严，则由相关土司处置。而且，每年三、四月间由四川提督派一名官员前往巡查一次，赏勤罚惰。时间一久，习惯养成，川藏道便与内地大路无异，盗匪定不敢再覬觎肆横，往来客商更可安危无虞³²。

不过，任国荣的方案随后被四川巡抚宪德（？—1740 年）、提督黄廷桂（1691—1759 年）等人否决。他们认为，任国荣所议虽有合理之处，但自打箭炉至拉萨目前共有 83 个塘站，如果每塘 15 名土兵，共需 1245 名，照雍正四年标准每名每日给工食银 5 分，每年共需银子 22410 两。每塘 5 匹马，共需 415 匹，每匹每日支給草干银 8 分，每年共需银子 11952 两。两项相加，费用十分庞大。如果不给的话，因有成例在先，恐土兵等藉口推诿，耽误公事。除了费用过多以外，每次“夹坝”出动，动辄数十名甚至百余名之多，纵然每塘添设十余名土兵，遇见劫匪也无力抵御³³。

他们正在筹划之时，抢劫事件却频密发生，且七世达赖喇嘛即将移驻新庙，清军亦计划从理塘撤走，此时必须酌量派兵缉拿“夹坝”，以保护行商，肃清道路。为此，宪德、黄廷桂提出一个汉、土兵丁巡哨护送往来客商的方案：自两河口至昌都一线，酌派官兵，每月选定日期，一边防护，一边行走。计算下来共需汉兵 160 余名，土兵 700 余名，共需银 3900 余两，相比任国荣的方案可以节省许多费用。因昌都至拉萨一线向来并无抢劫事件发生，故不必派兵巡哨³⁴。此折上于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730 年 2 月 14 日），约一个月后抵达御前，雍正帝令相关部门商议，可见此时其还没有再度大规模用兵的打算。

另外，任国荣又指出，近年来“夹坝”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理塘等处土司未用心

31 按，“台”属边疆地区的驿传系统名称，“塘”的军事特征较为浓厚。但此处任国荣可能仅是将有汉兵驻扎时称为“台”，无汉兵驻扎时称为“塘”。

32 《任国荣奏陈设塘宜用土兵治盗宜定责成暨穷民宜恤徇习宜改折》，雍正七年八月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16 册，1989：399。

33 《宪德黄廷桂奏报两河口地方设兵巡哨折》，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档号：故宫 016211 号。

34 《宪德黄廷桂奏报两河口地方设兵巡哨折》，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档号：故宫 016211 号。

防范所致，不主张一有抢劫案件发生便动用官兵进剿³⁵。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夹坝”劫匪的本质，但囿于与当时的主流声音相悖，从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他提出：

伏查里塘地势最高，天时常冷，且山多土瘠，除牛羊而外，别无出产。惟近水之家播植青稞一种，似内地之大麦，磨面糊口，故此地穷民倍于巴塘等处。但查所在荒土甚多，尚可安插，以资其生。乃该土官等止知遵法为奉职，民瘼概不关心。今三军在外，此辈犹知畏惧，刈草斫柴，尚自佣工度日。将来兵马撤回，既无倚赖，又无管束，恐难保其不因延饥寒而流为匪类也。³⁶

虽然他主要针对的是理塘，但瞻对与之相邻，自然条件相似，大部分地区海拔较高，且沟壑纵横，可耕之地极其有限，仅能于河谷两岸种植少量青稞，民生十分艰难。所谓“因延饥寒而流为匪类”，即资源匮乏导致民众生计艰难，不得不流为盗贼。人类学学者的研究表明，抢劫与生存困境存在很大关联，瞻对及其附近地区的粮食产量受限于高原的地形地貌、气候效应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综合影响，使其生存状况较为糟糕，抢劫他人的食物、牛羊等物品能够迅速维系、改善自身的生存状况，“是一种更为简单、直接的生存策略”³⁷。有鉴于此，任国荣提出应令各土司彻查穷民，年力精壮者令其开垦荒地，借给耕牛、种子；年力衰竭者令照管土司所属牛羊庄稼，终其余年。最终的目标是提升百姓的生活水平，防止他们因饥寒而流为“夹坝”。

任国荣亲身在理塘护卫七世达赖喇嘛，已居住半年有余，对当地的情形较为熟悉，其看法自然比岳钟琪更为切实。然而，不论官衔还是皇帝的信任程度，任国荣显然无法比拟岳钟琪，其主张也被淹没，反而被清廷派来的钦差大臣鼐格以办理“夹坝”不力为由弹劾。

雍正八年二月，刚从北京前来“照看”（实际上可以说是监视）七世达赖喇嘛的钦差大臣鼐格，目睹“夹坝”猖獗的景象，对任国荣所办十分不满。他向雍正帝上奏了一份满文折子，除了汇报数起抢劫案件的发生外，还主张用兵“征剿”。他称：七世达赖

35 《任国荣奏陈设塘宜用土兵治盗宜定责成暨穷民宜恤徭习宜改折》，雍正七年八月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6册，1989：399。

36 《任国荣奏陈设塘宜用土兵治盗宜定责成暨穷民宜恤徭习宜改折》，雍正七年八月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6册，1989：400。

37 罗波：《新龙“夹坝”的历史与文化解读》，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87-88。

喇嘛到理塘后，周围“番众”本应遵守王法，安静生活，然而却并不安分守己，肆意抢劫。噶达新庙建成后，远方之人必来朝拜达赖喇嘛，由西藏必然陆续送来许多物品，如果任由劫掠事件的发生，“必致人不行，路不通”。他并不了解当地部落以勇猛及能抢为荣的社会风气，仅以一般社会中“违法”的角度来看待抢劫现象：“唐古特人目无法纪，劫掠抢夺，皆是明目张胆，毫不隐瞒。每次抢掠，又甚振奋，而其为首之人明知此事，但又并不约束，才致于不知惧怕。”³⁸所谓“每次抢掠，又甚振奋”，显然是以抢劫为荣的文化基础造成，如任乃强先生所言：康巴人“常将其劫杀快意事夸耀邻里，邻里不以为恶，反颂其勇，他日遇劫杀事则拥为首领，以奖励之”³⁹。

这位鼐大人对瞻对等部落极为轻视，提出了一招用大炮轰击震慑之法：

对于此等今日归顺而明日即出抢掠之人，若不加征剿之，日后恶徒不仅不惧怕，反而其恶渐涨，以致于扰害地方上之良民，切断道路，耽误公事。伊等如此妄为，亦不过倚恃其住地附近山路之险而已。奴才鼐格查访得，伊等甚惧于大炮，在开镰之前，大军若到达伊等住地，即全可平矣。⁴⁰

这显然只是纸上谈兵，但却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赞扬：“所奏甚是。”实际上，鼐格乃是皇帝的耳目，负有监视任国荣等人之责，其主张也更容易得到皇帝的认可。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在鼐格及雍正帝看法的主导下，随后一百余年清朝在瞻对的用兵从未占到什么便宜，“夹坝”问题更从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鼐格于五月密奏任国荣情形，称其办理“夹坝”案件极不用心，本应当严拿并惩处盗贼，但仅仅派兵追赶数里后便收兵返回。他认为，“夹坝”猖獗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任国荣的轻纵，而且还将缉拿之事推诿于办理粮务的知县鲁国柱及塘务千总王如龙等人。在他们查出贼首姓名、住址时，任国荣理应缉拿盗贼，但却并未如此办理，仅派人去取回物品了事。总之，鼐格认为，任国荣“只想早晚换防回去，因而含混迁就”，“对盗案肆意推诿，不专心办理。以此看来，为人不勤奋，办事为一般”。雍正帝对其所奏颇为满意，朱批道：“所奏甚属诚实，知道了。”⁴¹看来，此时清廷已决定再度用兵瞻对，任国

38 《鼐格奏报里塘巴塘一带盗贼猖獗折》，雍正八年二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1998：1939。

39 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248。

40 《鼐格奏报里塘巴塘一带盗贼猖獗折》，雍正八年二月十七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998：1939。

41 《鼐格奏报任国荣等人情况折》，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998：1974。

荣不可能再继续承担指挥重任了。

实际上，“夹坝”活动深深植根于当地生产生活资源匮乏的土壤之中，清朝对其经济及社会文化根源了解不足，仅以一般意义上的违法犯罪行为来看待。所以，欲彻底清除“夹坝”，需要从改善当地的经济生产状况着手，而非一味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所谓的“震慑”。任国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但在雍正帝更加信任的鼐格看来，其所做乃是消极不作为的体现。兵威固然可以震慑一时，但承平日久，抢劫活动便会继续猖獗，这就是有清一代瞻对“夹坝”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的原因。在抢劫活动越发猖獗的背景下，鼐格的强硬政策更得皇帝的胃口，所以，清朝再次调兵遣将，欲彻底清理川藏道沿线的“夹坝”劫匪。

三、雍正八年清朝发兵瞻对与草率完结

雍正八年四月二十九日（1730年6月14日），清廷正式下令，以永宁协副将马光为正統領官并加总兵衔，成都城守营参将胡兆吉为副統領官并加副将衔，带汉、土兵丁清理瞻对、桑昂邦（ས་ངན་པ་，即三岩）等处“夹坝”。马光于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抵达成都，随即迅速赶往前线⁴²。出发之际，他向雍正帝请求用兵机宜，后者以“相机执中，勉为之，不可草率苟且，塞责误事，亦不可多事贪功”⁴³回复。雍正帝深谙中庸之道，令马光既不可草率了结，又不可像上次高奋志那样多事贪功。但实际上，要做到完美的境地极为困难，不从当地的生计模式与劫掠文化着手，一味用兵震慑，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清军兵分两路，于八月十五日（9月26日）进发，由游击王勇、刘敬等人带汉、土兵丁4970名由南路理塘一带进发，进攻下瞻对的门户擦马所与擦牙所；参将胡兆吉带兵7078名由北路霍耳一带进攻上瞻对。

上瞻对当时的土司名为七林平，但因年幼，由其叔阿宗邦代管地方事务。但阿宗邦威信不足，凡事都被头人鄂木桑珠把持。此人性格强横，经常率其同党四处抢劫，而且每次事后都声称乃阿宗邦属下之人，将罪名强加于阿宗邦。清军压境时，阿宗邦不愿抵抗，欲派人迎接并与清军将领见面，但被鄂木桑珠胁迫，不允许其出去，强迫其配合防

42 《马光奏谢赏加总兵职衔折》，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1989：1082。

43 《马光奏请恩赐训示折》，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1989：1083。

御要隘。鄂木桑珠又胁迫阿宗邦写信给下瞻对，约之一同前来抵抗清军。阿宗邦不肯配合，迁怒于鄂木桑珠，后者有杀阿宗邦之意，阿宗邦只好趁夜潜逃⁴⁴。另外，孔撒土司罗定之弟喇嘛昂旺因分家不平，与其兄常年构衅，多次勾结上瞻对抢掠周边地区⁴⁵。清军压境时，昂旺也投靠了上瞻对。上瞻对的战斗力似乎并没有马光预料的那么强悍，八月下旬的几次进攻中，清军进展顺利，据报攻破了200余所寨子，八月二十五日（10月6日）马光督兵至瞻对茹扎营。八月底至九月初，马光报称又攻破了数百所寨子，杀死2000余人，跳崖溺死、烧死者无数，鄂木桑珠亦在其中。

南路清军于九月初攻下擦马所与擦牙所，忽然有下瞻对土官汪扎尔登（即班滚扎纳登）的祖母扎深错带领所属头人赴营叩见投诚。汪扎尔登是测冷滚布之子，应当就是乾隆时期带兵抵抗清廷的班滚（*པལ་མཁོན་པོ་*），扎深错乃是测冷滚布之母，在雍正七年高奋志杀死测冷滚布后也曾向清廷投诚，此时故技重施。扎深错显然是一位具有政治经验的女性，她知道仰仗地险人强的优势，其属下可以和清军长期周旋，但若如此，则牺牲过大，面对更加强大的外部势力，臣服才是更明智的选择，所以雍正七年在测冷滚布被杀并带领属下抵抗了清军一段时间的攻击后，她便选择投诚。此刻她再次做出同样的决策。

既然已经投诚，马光不便再继续进攻了，他命令扎深错协助查拿尚未捕获的抢劫贼犯，立功赎罪。十月十八日（11月27日），扎深错同上瞻对已故土司的正妻革宋正（即现任小土司七林平之母）及上瞻对各头人至马光营盘，将已捕获的数名贼犯解到呈献。其中一名为丹批且已经潜逃之贼犯颇值得注意，据称其来自“藏里番部”，未详何时来到上、下瞻对交界的擦牙所居住多年，与鄂木桑珠等人同伙为盗。他十分狡猾，每当被揭发时，上瞻对查问即称属于下瞻对，下瞻对查问即称属于上瞻对。此次清军进攻擦牙所时，已经单骑潜逃，不知去向。马光令扎深错继续搜捕丹批的亲属，一个月后捕获了丹批之子白马太及侄曹藏太儿。两人供称：

丹批去年曾在黄土岗打劫过达赖喇嘛东西是实，昨闻大兵进来，已单骑潜逃。今所劫达赖喇嘛东西，虽一年以来花费大半，尚有数件收藏未失，若容赎

44 《马光奏报荡平瞻对桑阿邦等处贼番折》，雍正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档号：故宫 006063 号。

45 《查郎阿奏报惩剿劫夺不法之瞻对番人折》，雍正七年九月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档号：故宫 019927 号。

罪，情愿回去取来交纳。⁴⁶

由此供词可知，丹批曾在黄土岗打劫过七世达赖喇嘛所属物资，他很有可能便是表一所列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1730年1月20日）劫案的凶手。看来，“夹坝”们并不区分物资属于何人，不论是川藏道上的塘兵、汉藏商人，甚至是达赖喇嘛的物资，他们都照抢不误。随后马光派千总马弘道押着白马太与曹藏太儿到山里搜出靴、帽、哈达、木碗、鞍子等物若干。马光认为，白马太与曹藏太儿虽系丹批子侄，但既愿引路搜出赃物赎罪，不便立即斩首，应当暂时留存，以诱擒丹批。随即将两人交付德格土司丹巴七立，假称宽恕罪责，令其设法擒拿丹批。又将达赖喇嘛的物品一一清查后，派人交付惠远庙，雍正九年（1731年）正月，七世达赖喇嘛拿回了这批被抢的物品，向皇帝之恩表示感激⁴⁷。

关于善后事宜，马光认为，下瞻对土司去年方新颁发号纸，如今既能献出贼犯赎罪，似乎可以许其改过自新。拟将擦马所地方仍令其管辖，并出具永不犯法甘结，将其胞弟白马洽礼交明正宣慰司坚参达结处为质，准其照旧住牧原处，管辖百姓。所有贡赋钱粮，仍交明正土司处征收完竣⁴⁸。

至于上瞻对，马光主张将各处分隶周边土司管辖，以分其势。已故老土司俄木中的长子七林平并无劣迹，嫡子（即革宋正之子）郎佳亦未做盗，当地百姓都愿意扶植此两子管理百姓，以继承俄木中之裔。具体来说，擦牙所等处地方令七林平管辖，由德格土司丹巴七立节制；临雅砻江的十余处地方令革宋正带子郎佳管辖，其中江西的阿色、阿结等地由孔撒土司罗定节制，江东的瞻对茹、达盖等地由麻书土司郎喀索朗节制。令七林平、革宋正、郎佳出具守分当差、永不纵番犯法甘结，并将七林平表弟零钦墩珠交郎喀索朗为质，将郎佳之兄兼燦交罗定为质，并令丹巴七立、罗定、郎喀索朗等出具永保瞻对无事甘结存案。所有贡赋由七林平、革宋正、郎佳等催收后，交丹巴七立、罗定、郎喀索朗处上纳⁴⁹。总之，将上瞻对一分为三，分别由德格、孔撒、麻书三土司节制。

46 《马光奏报荡平瞻对桑阿邦等处贼番折》，雍正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档号：故宫 006063 号。

47 《肅格奏报将被抢商上之物业已给还折》，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998：2019。

48 《马光奏报荡平瞻对桑阿邦等处贼番折》，雍正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档号：故宫 006063 号。

49 《马光奏报荡平瞻对桑阿邦等处贼番折》，雍正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档号：故宫 006063 号。

善后之事完结后，马光另将所有捕获的劫匪斩首梟示，鸣金收兵，并向皇帝上奏。雍正帝在马光的长折子后仅批“览”字，似乎并无过多意见。至此，此次用兵瞻对宣告完结。新近出版的《康藏史》对此次用兵有一段叙述：“1730年，四川总督为回击瞻对的反抗，派遣副将马良柱率领12000余名官兵前往瞻对征剿。”⁵⁰由以上对档案材料的挖掘来看，此处有两处错误：第一，用兵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回击瞻对的反抗”，而是为了回应雍正七年底至八年初频繁的抢劫行为，雍正时期的两次用兵虽然间隔时间只有一年，但不可简单地将其视作一体。第二，领兵者应当为永宁协副将马光，非马良柱，后者乃是乾隆十年用兵瞻对时的指挥官之一。

总之，马光虽然杀了一些“夹坝”，但重要贼首丹批实际上已经潜逃，马光只是捕获了丹批的子侄，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地方土司们的势力，其随后便被升任四川总督⁵¹的黄廷桂与巡抚宪德参奏。但黄廷桂在向上汇报此次用兵的题本中，却称马光效力之处甚多，对此前后矛盾情形，雍正帝颇感蹊跷，专门寄信询问黄廷桂。他怀疑黄廷桂等可能与马光有隙，或者瞻对一事并未完结，仅是“迁就含糊草率结案”罢了，故令黄廷桂等据实回奏⁵²。

黄廷桂等接阅之后，“惶惧无地”，连忙向皇帝解释称，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九日（1730年12月28日）他们接到马光的报告，称胡兆吉已分兵于十一月初四日（12月13日）前往桑昂邦清理，马光带兵仍然驻扎瞻对料理，但随后不久马光便撤兵了：

臣等以为，马光仍驻瞻对，自是深知贼首可获，故议令胡兆吉前往桑阿[昂]邦，以图两处事皆速结，而捷奏可以早慰圣心也。且臣等访闻，阿宗邦、格斗平、丹批三犯比时已有可以诱擒之机，詎意日望一日，乃马光遽将汉、土官兵一并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檄撤回营，不能复止，以致首恶已可就擒，而领兵首将坐失事机。是以臣等深恶其不实心料理，具折参奏。⁵³

黄廷桂等以为分兵两路的原因是马光希望能够尽早完结，并且丹批等人当时已有可

50 石硕主编：《康藏史》（古代卷），2023：437。

51 雍正九年清廷曾设四川总督一员，但具有临时性质，雍正十三年裁撤，恢复设置川陕总督。参见乾隆《雅州府志》卷10《兵制》，《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第28号，1969：232。

52 《黄廷桂宪德奏报汉土官兵进剿瞻对番贼之情形》，雍正九年八月初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档号：故宫016219号。

53 《黄廷桂宪德奏报汉土官兵进剿瞻对番贼之情形》，雍正九年八月初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档号：故宫016219号。

以诱捕的时机，但马光此时却将兵丁撤回，以致坐失事机。其中提到的三人中，阿宗邦在扎深错的供词中曾经出现，称其未参与抵抗清军之事，但似乎另有隐情；格斗平在马光的奏折中并未出现；丹批是“夹坝”头目之一，马光仅获其子侄，并未捕获本人。另外，黄廷桂等在核查用兵钱粮时发现“支放不符”，且理塘土司向其控诉用兵时颇受苦累情形，故黄廷桂等不敢隐瞒，将马光参奏。

雍正帝于黄廷桂等奏折后朱批：“览，已有旨谕部矣。”⁵⁴ 遗憾的是，笔者遍寻已出版的谕旨、起居注、实录及未刊之档案，也没有找到雍正帝针对此奏发出的谕旨。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光被参确有缘由，他在并未捕获全部贼首的情况下便迅速撤兵，难逃办理疏忽及草率了结的责任。

四、余论

有清一代针对瞻对的用兵，最早便可追溯至雍正时期，其是在康熙末雍正初川藏道及康区在清朝治藏战略中地位逐渐提升的背景下发生的。西藏噶伦内乱事件发生后，清朝再次派一路大军由川藏道进藏，又在沿途安设塘站与粮台，川藏道地位再次提升。可是，以瞻对为首的各部落却多次抢劫，对川藏道的畅通产生了较大威胁，为此清廷发兵欲清理“夹坝”。但高奋志擅自把并未明显抵抗的瞻对土司测冷滚布杀死，这一冒失行为激起了瞻对民众的抵抗。在测冷滚布之母投诚后，清廷只好仓促收兵，非但没有“震慑”到“番民”，反而使后者加深了对清廷的轻视与不信任感。清军自藏撤回时，将七世达赖喇嘛同时带至理塘，清廷对康区及川藏道沿线的防守事务更加重视。但偏偏在此时，“夹坝”活动愈发猖獗。在当地驻扎的任国荣的改善经济状况以消弭“夹坝”的看法在清廷上下不占主流，其反而被主张强硬用兵“震慑”的钦差大臣鼐格弹劾，于是清朝发动了第二次瞻对之役。然而，马光在未捕获全部首犯的情况下即仓促撤兵，非但没有震慑住“夹坝”，反而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随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各朝，清朝又多次用兵瞻对。乾隆九年（1744年），瞻对“夹坝”再度出动，甚至抢劫了川藏道上的清朝塘汛兵丁，引发乾隆帝震怒，掀起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战争。在乾隆用兵瞻对期间，可以时时看到雍正朝办理不善的影响。例如，抢劫事件发生后，时任四川巡抚纪山因态度软弱被乾隆帝训

54 《黄廷桂宪德奏报汉土官兵进剿瞻对番贼之情形》，雍正九年八月初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雍正朝”，档号：故宫 016219 号。

斥，纪山回应道：“此次抢夺官兵行李，理应奏请惩以大法，缘雍正八年征剿瞻对大费兵力，总因该番恃险，攻击匪易。惟恐不筹画于事前，未免周章于日后。”⁵⁵可见雍正之役给四川地方官带来的阴影。乾隆帝更是在战中反复强调：“倘此番料理不善，或至有损军威，或仍似雍正八年草率完结，复留后患，朕当于庆复、纪山、李质粹是问！”⁵⁶“倘仍如雍正八年之草率完结，复为今日之害，则庆复、纪山、李质粹不得辞其咎也。”⁵⁷讽刺的是，此役非但没有捕获瞻对土司班滚，反而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统兵将领以班滚烧死捏报战功，匆匆撤兵了事，但一年后班滚便复出活动，令朝廷颜面扫地。

嘉庆时，中瞻对土司洛布七力（ $\text{ལོ་བུ་ཇེ་རི་$ ）势力渐强，在与周边土司的仇杀互斗中误伤了清朝塘汛官员，引发了又一次对瞻对的用兵。此役几乎重蹈了乾隆之役的覆辙，一场大火之后，洛布七力失踪，两年后却疑似复出活动⁵⁸。道光时期，洛布七力之子工布朗结（ $\text{ཨ་མོ་ལོ་ལྷ་མོ་ཀླུ་ལ།}$ 1799—1865 年）兴起，时任四川总督琦善曾对其进行过一次征讨，非但未起到“震慑”作用，反而助长了工布朗结的狂妄气焰⁵⁹。至同治时期，工布朗结完全阻断了川藏道，西藏地方政府配合清朝将之平定，作为嘉奖，清朝将瞻对地区的管辖权赏给西藏地方。但晚清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逐渐恶化，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该地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引发了更加深重的边疆危机。直至宣统三年（1911 年），清朝方将其收归四川省，改土归流，这一弹丸之地引发的难题几乎贯穿了整个清朝。因此可以说，雍正朝办理不善是此后“瞻对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的重要根源。

◆ 刘锡钺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研究员

55 《清实录》第 11 册，《清高宗实录》卷 231，乾隆九年十二月壬申，1985：987。

56 《清实录》第 12 册，《清高宗实录》卷 240，乾隆十年五月丙子，1985：91。庆复时任川陕总督，李质粹时任四川提督。

57 《清实录》第 12 册，《清高宗实录》卷 242，乾隆十年六月丙辰，1985：129-130。

58 张秋雯：《清代嘉道咸同四朝的瞻对之乱——瞻对赏藏的由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22）：401-407。

59 昔绕俄热：《新龙贡布郎结兴亡史》，政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85：17-18。

interactions with the Pakmodrupa regime reveal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rough which Tibetan monks transitioned from "religious practice" into "political affairs" during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A Study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Tsangyang Gyatso's Travels to the Guangren Temple in Xi'an in 1708

Hu Xiaobing and Ciren Deji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zang Police Academy)

The Manchu palace memorial includes vermilion endorsements by the Kangxi Emperor, entitled "The Memorial of Boji, the Governor-General of Sichuan and Shaanxi, Requesting the Zasak Lama to Travel to Beijing for an Audience." This work reveals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Sixth Dalai Lama Tsangyang Gyatso traveled from the east in early 1708, passed through Shaanxi, and stayed at Guangren Temple in Xi'an—a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y built by imperial decree of the Kangxi Emperor in 1703—to chant sutras and pray for the Emperor's longevity. This proves that the claim recorded in certain docu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that Tsangyang Gyatso passed away by Qinghai Lake in 1706 is untenable. In particular, the statement in the *Secret Biography of Tsangyang Gyatso* that he traveled through Mongolia, Xizang, Gansu, Qinghai, and Sichuan, as well as India and Nepal after 1706, still requires further corroboration. Nonetheless, his residence at Mount Wutai likely contains some historical truth. Both Tsangyang Gyatso's trave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ren Temple in Xi'an ar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the Qing court's Mongolian and Tibetan political-religious strategies, which aimed to "suit popular customs and bring convenience to the people."

The Relocation of the Seventh Dalai Lama to Kham Region and the Battle of Nyarong in 1730

Liu Xiyue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at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Controlling the throat of the Sichuan-Xizang highway, Nyarong (Zhandui 瞻对) is a unique area between Sichuan and Xizang. The Qing court launched multiple military campaigns against it, and every local incident there reverberated across the entirety of the Sichuan-Xizang theater; consequently, the "Nyarong Question" has long attracted scholarly attention. However, the Yongzheng period, during which this issue first emerged, has receive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The Nyarong Campaign of the

eight year of the Yongzheng reign (1730) took place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the Seventh Dalai Lama's relocation to the Kham region and the rising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Sichuan-Xizang route within the Qing dynasty's governance of Xizang. A series of robberies along the Sichuan-Xizang route from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eventh year of the Yongzheng reign (1729)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h year not only threatened the safety of the Seventh Dalai Lama but also obstructed the Qing court's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Xizang via this corridor, prompting the Qing court to dispatch over ten thousand troops for a "suppression" campaign. This military action constitutes the second Nyarong battle launched by the Qing dynasty and should not be conflated with the first Nyarong battle that spanned from 1728 to 1729 (the sixth to seventh years of the Yongzheng reign). The Qing general, Ma Guang 马光, hastily withdrew his forces without capturing all the primary culprits. Far from deterring the bandits, this premature withdrawal left behind the critical root cause for why the "Nyarong Question" could not be fundamentally resolved for a long time thereafter.

A Study on the Successive Incarnations of the Zasak Da Lama of the Dolonnor Monasteries during the Kangxi, Yongzheng,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s

Sodbilig Huhe-Borjigid

(Archives of Xizang;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llowing the Dolonnor Alliance, the Qing court successively or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Huizong 汇宗寺 and Shanyin 善因寺 monasteries in Dolonnor, and stationed a Zasak Da Lama to oversee the monastic community of the Dolonnor monasteries. Consequently, Dolonnor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one of the Buddhist centers of Inner Mongolia, south of the Gobi Desert. By examining the personnel successions of successive Zasak Da Lamas of the Dolonnor monasteries during the Kangxi, Yongzheng,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most Zasak Da Lamas from Dolonnor were eminent monks hailing from Qinghai who had either studied or served in Xizang or Beijing. This characteristic reflects the balancing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Qing court regarding its Buddhist policy towards Mongolia. Appointing Zasak Da Lamas to manage Buddhist affairs in Mongolia, in other words, allowed the Zasak Da Lamas to serve as a bridge linking the two regions and to maintain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s of Xizang and Mongolia.